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研究报告(第2期)



#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建设评估

复旦大学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协同创新中心  
2015年2月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研究报告

#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评估

第 2 期

2015 年 2 月

## 作者简介

**韦宗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中华美国学会理事，上海美国学会会员，中美富布赖特高级访问学者，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学者。

主要从事美国国内政治、外交与安全政策及中美关系的教学与研究。出版专著《霸权阴影下的对外政策》、合著《约翰逊时期的美国对外政策》，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 30 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印太安全布局困境及中国的应对之策研究》及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新兴大国协调与全球治理改革研究》等课题多项。

##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评估

2015年1月15-16日，由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亚太合作与治理中心、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及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评估”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成功举办。来自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国防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及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二十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此次学术盛会，外交部美大司司长丛培武应邀出席会议并作主旨发言。

与会专家学者回顾了過去两年的中美关系，就中美如何克服安全困境、中美两国的亚太地区秩序观、中美在全球事务合作中的障碍、未来两年中美合作机遇及如何管控分歧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取得了一些重要共识。

### 一、对过去两年中美关系的回顾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教授在开幕词中指出，自从两年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以来，中美两国在构建新型大

国关系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何总结经验，继续落实和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课题。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 C. Bush）也指出，自中美两国领导人2014年北京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晤以来，中美关系出现了非常好的发展势头，在很多问题上都取得了积极进展，两国关系发展出现了新机遇。如何把握好机遇，特别是在奥巴马接下来两年任期里继续推进中美关系向前发展，非常值得讨论。

与会学者认为，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尽管两国关系存在一些问题，但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积极进展。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袁鹏指出，过去两年中美关系虽有波折，但还是取得了不少成就，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两国领导人高度重视双边关系。两国领导人非常清醒认识到，两国关系应该保持稳定、向前发展。二是军方交流取得突破。中美之间进行了80多次军方交流，是历史上最好时期。三是人文交流如火如荼。去年双方首次将中美人文高层交流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同时进行，两大对话机制成为中美交流机制化的重要载体。同时，奥巴马访华期间宣布美国对华签证的便利措施，进一步方便了两国间的人文交往。四是全球合作取得进展。中美两国在埃博拉疫情控制、全球气候变化、

全球经济复苏、防扩散等问题上进行了广泛合作。

卜睿哲指出，两国在东亚地区互动出现了一些积极势头。他说，朝鲜半岛总体而言形势好转，美国认为这是中国在静悄悄地管制朝鲜。这说明，如果中国愿意管理朝鲜，是能够取得效果的。在海洋问题上，中美之间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特别是中美关于海上相遇行为准则的制定，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危机升级。中日关系方面，目前存在一些非正式的建立信任措施（CBM）的交流，如果能够建立正式的互信交流机制效果会更好。

吴心伯认为，从过去两年中美关系的发展来看，中美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方面至少取得了两方面的成果。第一，中美建立了两国领导人交流的新模式。2013 年中美首脑在安纳伯格庄园的非正式会晤，建立了一种有别于以往多边或双边场合下的正式会晤或礼节性会晤机制。这一非正式会晤机制更加轻松活泼，不拘一格，谈话的内容也更加广泛、深入，尤其是这次北京瀛台夜话，两国领导人交流了治国理政经验，谈及两国的历史和文化，有助于加深理解和建立私人关系。第二，自 2013 年以来，当两国关系遇到难题时，双方没有越过对方底线，例如在斯诺登事件以及东海防空识别区等问题的处理上，双方都留有余地，不触及对方底线。这有助于构建两国间的互信关系。

中美关系在取得进展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需要着手解决的问题。袁鹏认为，过去几年里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首先，双方在工作层次的交流不是很顺畅，有时甚至不是很友好。例如，美方抱怨中方在防空识别区问题上事先完全没有与美国沟通，搞“突然袭击”。中国则认为美国在 TPP 问题上让中国措手不及，事先没有沟通。其次，两国网络安全关系在下降。美国对中国军方人员的起诉是一起十分恶劣的事件，导致中美网络工作会议的中断。再次，中美关系受到中日、中菲、中越等第三方因素的消极影响，美国在东海、南海争端上偏袒盟友与安全伙伴。最后，两国媒体对中美关系的塑造作用日益增强，但总体而言消极作用可能大于积极作用。吴心伯也认为，美国在网络问题上对中国兴师问罪是个不恰当的做法，开了不好的先例。美国对中国的很多倡议也满腹狐疑，过于防备。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李侃如（Ken Lieberthal）、乔纳森·波拉克（Jonathan Pollack）及卜睿哲等人则提出了他们对中美关系的几点担忧：第一，中美关系正在朝着战略竞争者方向滑落，两国存在严重的战略互信赤字；第二，美国对中国在东亚的言行感到担忧，中美如何在东亚相处将会对两国长远战略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第三，美国对习近平在亚信峰会上提出亚洲的安全由亚洲人处理感到不安，担心

这将是中国的门罗主义，要消除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力。

中美如何处理存在的分歧及问题，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丛培武司长对此提出了六条政策建议。首先，加强高层对话，减少战略不信任。两国元首应进行定期会晤，坦诚交流，增加互信，相互尊重，减少战略误判。

其次，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加强两国关系。相互尊重不能作为谈判的筹码或恩惠。两国相互尊重彼此的政治选择，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尊重多样性，不求整齐划一。

再次，深化务实合作。深化在经济、反恐、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加快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加强军方交流，在军方两个文件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合作。要加强人文交流，积极促进地方政府合作、思想库合作、民间交流。

第四，妥善处理分歧与敏感问题。在分歧问题上，两国要多对话，管控好分歧。在敏感问题上顾及对方，如台湾、香港、西藏、网络安全等，不要伤害对方核心利益。特别是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的核心、敏感问题，希望美国致力于两岸和平，遵守三个联合公报，采取具体行动，促进两岸和平发展，将台湾问题由两国的负资产变成正资产。

第五，在亚太地区进行包容性合作。习近平指出，太平洋足够宽广，完全容得下中美两国。中美两国应该成为伙伴。

中国尊重美国在该地区的传统利益，希望美国扮演建设性作用。中美可以合作共同促进亚太安全，希望美国在亚太地区应该采取公正立场，不选边，特别是在地区海洋争端问题上。中国希望与地区国家及美国一道共同促进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第六，共同应对挑战。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制在应对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应该加强其作用，同时要改革其不合理的地方，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改革问题要落实。在乌克兰、朝核、阿富汗及气候变化等问题上，中国将继续与美国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卜睿哲指出，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情况下，更需要妥善处理两国间的竞争问题、第三方问题，需要准确判断对方战略意图，需要两国元首对国内舆论进行引导，营造有利于发展两国关系的国内舆论环境。

吴心伯认为，在中美实力对比及亚洲权力变迁的大背景下，美国应该容纳中国的合理需求，如中国维护其海洋权益、谋求在亚洲事务中更大的发言权等，美国应从更为宽广的时空维度来考虑中国的地位和作用，不能一味排斥和抵制。其实中国在亚洲发挥更大的作用，对美国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是对美国在亚洲作用的有益补充。

## 二、如何处理中美之间正在出现的安全困境？

作为历史、文化、基本制度及国情都迥然相异的两个大国，中美之间是否存在崛起大国与既有大国之间的安全困境及修昔底德陷阱？与会学者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中美之间的确存在某种程度的安全困境，但如果处理得好，就能够克服历史上崛起大国与既成大国间的修昔底德陷阱。

中国国防大学杨毅少将指出，中美制度及历史文化不同，随着中国快速崛起，特别是军力快速增长，两国的确存在一定程度的安全困境。不过，杨毅指出，中美两国处于相互依存加深、互动密切的全球化时代，中美两国领导人也都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因而两国能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他还对发展中美关系提出了政策建议。第一，继续加强战略交流。最高领导人及军方高层之间都应开展形式多样的正式及非正式交流。第二，要善于换位思考，不要指望对方一夜之间改变政策和行为，不要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第三，在共同利益领域继续合作，通过合作提升关系，如朝鲜半岛、伊朗、阿富汗等热点问题。在双方意见不同的地方，如东海、南海争端等问题，要善于管控分歧，避免直接冲突。第四，加固既有交流机制，执行好两军不久前达成的两个新机制，拓展合作新领域。例如，中美能否考虑向对方开放新军事训

练场所，增加各个层级的军方交流等。第五，将两军关系的新变化朝着积极方向推进。要善于妥协，避免零和博弈。第六，不要伤害对方重要利益，进一步增加政策透明度，特别是针对第三方的政策。要切实管理好与第三方关系，这对两国关系发展十分重要。

波拉克则对中美两国能否避免军事冲突感到担忧。他认为，中美安全关系有三个方面令人担忧。一是军方的利益需求。军方领导层需要很高的军事开支作为机构生存的理由，需要制造敌人来获得资源，都有将对方作为对手的理由；二是军事能力与战略意图不确定性。美国无法确信中国的战略意图，现在中国拥有进行军事竞争的强大经济能力，单单这一因素就令美国担忧；三是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在加大。中国军力的快速崛起及美国对中国担忧加剧，正在增加长远而言两国发生高端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波拉克指出，要打消两国之间的猜忌和不信任，两国领导人和军方之间必须能够坐下来进行坦诚、深入的托底交流。例如，中美两国希望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中美在这个世界中各自的位置是什么？中国会不会利用其新军事能力攻击美国的软肋使之丧失首次军事打击能力？他指出，问题是，目前为止，中美军方缺乏深度坦诚的战略交流，两国军方及学者越来越多地谈论中美冲突的可能性。美国对其军

事优势长期以来习以为常，但美国军方现在谈论最多的，也是最担心的是，随着中国军力崛起，特别是在网络、打击航母武器等新领域能力的崛起，中国会在危机中率先采取军事行动，攻击美国的军事弱点，让美国丧失首次打击能力。

吴心伯等人则提出中美之间如何在西太平洋和平共处、克服彼此之间的安全困境问题。吴心伯指出，当前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力、态势及军事原则很大程度上针对中国，这与冷战时期及冷战结束初期有很大不同。奥巴马亚洲再平衡战略虽然称不上是要遏制中国，但制衡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中美两国领导人应该就中美如何在西太平洋和平共处、避免战争进行坦诚交流。当年邓小平判断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调整起到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现在如果中美双方形成共识，认为中美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是可以排除的，无疑将会对未来中美互动产生良性影响。

李侃如指出，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维持什么样的军力、态势及奉行什么样的军事学说，很多时候不是基于政治考虑，而是基于部门利益。美国军力的决定因素，特别是某种军事能力的发展很多时候是由国内政治驱动的，如军种之间的竞争、资源竞争等。他感到遗憾的是，中美两国关系虽然好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但中美两军之间缺乏类似于美苏之间的坦诚对话。中美两国需要通过对话确立政策及行为底

线，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某些机制，这对增进中美战略互信十分有益。

### 三、中美亚太秩序观

面对亚洲权力及秩序变局，中美到底希望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亚太秩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教授指出，当前亚太地区安全结构是一种以美国为中心的双边军事联盟体系及安全伙伴关系安全架构。它对维护亚太安全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消极作用也很明显。第一，当前的安全结构非常依赖美国，一旦美国国内出现风吹草动，就可能对这一安全结构产生影响。第二，美国的双边联盟体系是排他性的，在亚太地区划分“我们”和“他们”，尤其是中俄感觉是被排除在外的“他者”，诱导中美双方的猜忌乃至敌意，损害了中美合作。第三，当前的安全结构不支持中俄在地区扮演更大角色。这些是美国的机制，中俄对此比较消极，有时感觉应该采取措施加以应对。

贾庆国指出，需要对这一安全架构进行改革，兴利除弊。从长远看，应该建立地区范围的具有包容性的有效多边安全机制，替代当前双边排他性军事联盟。这将是一个渐进的改革过程，不是在新机制还未建立时就推翻既有安全机制，更不能损害大多数国家的安全利益。要分几个阶段逐步推进改

革：第一阶段，增强现有安全机制的作用；第二阶段，将现有安全机制融入地区范围内的包容性安全机制，削弱既有双边安全联盟；第三阶段，逐渐用多边机制解决迫切问题，而不是用双边机制，这样就可以逐渐替代双边安全机制。这一改革的方式，可以采取官方对话和非官方的对话平行推进的方式，改革的最终目的是避免冲突、增加合作，更加有效应对地区安全挑战。。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李成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并非由一整套战略谋划从上而下制定好的，往往是由诸多突发事件驱动的。同时，由于美国是个多元社会，不同的部门、利益集团相互角力，因而很难有一个一成不变的世界观或地区战略观。当然，在谈到战略方面，有一些基本的判断，如美国在亚太地区应该继续维持其重要利益，继续成为地区主导性的军事、经济大国，希望维持地区稳定，不希望在东海、南海、台海、朝鲜半岛发生热战。同时，美国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更加日益关注。

李成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可以有三种战略选择。一是孤立主义，卷起铺盖走人；二是拓展介入，加强地区多边机制，让大家在多边机制中逐渐养成合作习惯；三是建立新安全机制。他指出，亚太地区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谁是威胁及如何应对都还不确定，美国还在摸索，还没想好要采取哪一

种战略选择。

吴心伯指出，历史地看，亚太地区曾经存在几个亚太秩序观。一是当年日本的大东亚地区秩序观，希望独霸亚太，并不惜为此发动战争；二是冷战期间美苏两极秩序观；三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在亚太的霸权秩序。他指出，亚太地区过去是美国霸权，但现在亚洲国家更加活跃，中国、日本、东盟等在地区事务中十分积极，这为亚太地区秩序提供了新动力。中国已成为地区经济的中心，而在安全领域，其他亚洲行为体不希望中国做大，希望借助美国制衡中国，均势逻辑十分明显。所以，在亚太地区，经济和安全遵从不同的逻辑。他认为，构建新的亚太地区秩序观，需要中美就地区秩序构建进行一场大交易（grand bargaining），同时也允许其他地区行为体如日本、东盟等扮演角色，但必须在中美框架下行动。如果中美这样做，需要对该地区行为体的角色和地位重新界定，同时美国也要重新思考中国在东亚的地位、角色及海上利益边界。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教授指出，地区秩序现在或许是中美之间第一大议题。美国应该认识到亚洲的变化。大多数亚洲国家，包括日本的经济增长都依赖于中国，中国是大多数亚太国家最大贸易伙伴，这是一大新现象。同时亚洲的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交叉影响。例如上海合作组织开始

在谈论经济问题，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的经济合作如火如荼。美国的亚太安全观落后于亚洲的新发展，还在坚持双边联盟体系，认为美日同盟是亚洲安全的基石。中美新亚太秩序观应该是，任何新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安排都应该彼此包容，而非相互排斥。

针对中国学者对于美国双边联盟体系的质疑，卜睿哲指出，东亚地区的现实决定了美国必须继续坚持双边军事联盟体系。美国需要双边联盟来应对朝鲜核武器问题，特别是其东亚盟国韩国、日本对此十分关注。更大问题是，多边地区安全机制必须从现实的角度考虑。在东亚地区，大多数国家更愿接受联盟的存在。卜睿哲强调，美国在东亚的目标不是要维持支配地位（dominance），而是领导地位，中国也并不处于边缘地位，中国早已扮演了重要角色。

波拉克对贾庆国提出要在东亚构建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感到困惑，他提出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要排除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建立这一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标准是什么？哪些国家可以加入？哪些需要排除？这种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对美国的利益是否构成威胁？既然该地区大多数国家对当前美国的军事作用感到满意，那么为什么还要尝试那些并不知道其作用的多边安全机制？

袁鹏指出，当前亚太地区的安全机制是美国主导的。中

国在亚信峰会倡导亚洲新安全观，在亚太经合组织倡导成立亚太自贸区，就是要扩大亚洲国家在事关亚洲安全及发展事务上的发言权。他提出，在亚太安全合作方面，中美合作（不需要形式上的安排，只需要非正式谅解）应该是未来亚太安全机制的基础；其次是东盟+X；第三层次则是上合组织、六方会谈、南亚地区机制等，最终形成一体化的地区安全机制。李侃如表示，袁鹏的提议尽管不是 G2，但可能会令亚洲其他国家感到担忧，担心中美合谋共同主宰。

#### 四、中美全球事务合作的障碍

与会专家认为，中美在全球事务合作方面，依然存在一些障碍。第一，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态度。黄仁伟指出，中美两国对对方在国际体系或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认知差距。美国认为，中国现在的很多新倡议和新机制，如亚洲安全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等，都排除了美国，中国似乎试图削弱现有体系。而中国认为，中国不是现有体系的革命者或挑战者，而是参与者和建设者。相反，近年来美国似乎在“另起炉灶”，拟建立的新机制，如 TPP 和 TTIP 都试图排挤中国。吴心伯提出，中美在全球事务中的合作在权力、规则和机制等方面都存在障碍。中国希望提供更多国际公共物品，美国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与

中国分享权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改革问题上，奥巴马有多大诚意去推动国会采取行动？此外，中国现在有时更愿意通过新机制来推进全球治理，中美如何磨合？这些都可能对中美全球合作产生不利影响。对此，李侃如坦率地回应，美国新一届国会不会让奥巴马做成任何事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改革问题已经进入了死胡同。

第二，对大国责任的定位。李侃如指出，中美两国在大国责任定位上存在差异，美国认为全球大国应具有全球责任，大国要履行大国责任，而不仅仅是狭隘的国家利益。而中国的思路不是，对此感到不适应，不舒服。同样，美国现在对中国崛起感到担忧，对美国全球领导的经济基础感到忧虑。此外，李侃如指出，美国将支持和推广自由民主体制视为己任，中国对自己的定位非常不同，认为美国推广民主是在削弱中国的现存体制。这些都是进一步合作的障碍。

第三，具体领域的合作障碍。与会学者认为，在网络安全、反恐、气候变化以及 TPP 等方面，中美两国都存在相当程度的合作障碍。袁鹏等人提出，当前国际恐怖主义似乎在回潮，中国新疆的恐怖主义活动在上升，两国在反恐领域可以合作，但问题是，美国在认定中国的新疆恐怖分子方面似乎存在双重标准，未来美国会重新考虑吗？其次，关于网络规则制定及网络主权问题。中美能否就网络行为规则达成协

定，然后推广到全球？中美能否进行合作成为网络规则的制定者、领导者？网络领域是否存在主权问题？对此，李侃如表示，美国不大可能扩大认定新疆恐怖分子，因为这涉及技术及司法问题。在网络规则方面，中美联合制定网络规则然后约束其他方的可能性不大。他指出，中美双方对本国在网络领域里所做的事情要坦诚，目前没有这种坦诚。至于网络主权问题，美国认为网络是全球公域，不存在主权问题。李侃如最后强调，未来五年里，网络安全、气候变化及反恐这三大问题将会对中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两国如何克服在这些领域的合作障碍，加强对话与合作，十分紧要。

## 五、中美如何抓住机遇、管控分歧？

如何抓住机遇，促进双边关系良性互动？大多数学者认为，在接下来两年里，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加强双边投资谈判。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国友以及袁鹏、杨毅等人提出，希望中美两国能够加速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最好能够在年内完成谈判。吴心伯还提出，希望美方的外国投资委员会改革能够尽快取得进展，为中国对美投资减少障碍。李侃如指出，在谈及中美关系时，中方似乎过于强调尊重、平等等面子上的事情，但美国更看重具体领域的合作。不过，李侃如表示，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问题上，

由于奥巴马政府现在致力于推进 TPP 谈判，需要动用很多政治资产，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又阻力重重，不大可能在中美投资协定和 TPP 两个问题上同时开工，年内完成中美投资协定的可能性不大。

第二，更新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袁鹏、吴心伯、李侃如等中外学者都指出到，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需要新思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已经举行了七轮，双方对此都有些“对话疲劳”，需要发挥新思维，使之在形式和内容上能有所突破。

第三，创建中美外交与安全“2+2”对话机制。袁鹏等人提出，美国与很多盟国之间都举行了“2+2”对话，以加强对话的战略性和统筹性，中美之间也应适时启动这类对话。此外，两国还可以考虑开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之间的对话，希望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在这方面能够有所作为。

第四，两国领导人会晤。袁鹏等人提出，双方领导人至少每年会晤一次，最好将领导人会晤拓展成“1+1”模式，即一种是安纳伯格庄园式的非正式对话，另一种是较为正式的峰会。李成提议，能否在习近平今年访美国期间，邀请他访问布鲁金斯学会并发表演说，让智库在中美交流方面发挥更大影响。中方学者表示这是一个很好的提议，但需要进一

步协商。

第五，加强全球治理领域合作。中方学者表示，中美两国需要考虑一些大问题，应该联合起来在维护全球秩序方面发挥领导作用。要抓住机遇，进一步加强在气候变化、WTO谈判、反恐及阿富汗建设等方面的合作。

在谈到如何管控分歧时，与会学者重点讨论了四方面内容。第一，台湾、香港问题。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信强等人提出，在接下来两年里，台湾问题有可能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障碍。前不久发生了台湾驻美代表处“升旗事件”；奥巴马迅速签署了对台军售法案；2016年台湾岛内又将进行“总统”选举，这些都有可能对两岸关系及中美关系造成冲击。吴心伯等还指出，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及民主基金会等机构与香港“占中”人士联系频繁，对香港2017年选举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兴趣，很不正常。卜睿哲、李侃如等人表示，第一，台湾在华盛顿的升旗事件是个孤立事件，马英九并不很清楚，事后也十分生气。第二，过去四五年里，美国对台售武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更致力于台湾的防御，这也将是今后美国对台售武的基础。第三，从目前形势看，民进党的蔡英文很可能赢得2016年台湾选举，民进党将控制立法院。对两岸关系来说，蔡英文能否接受“92共识”将是个考验。蔡英文的大陆政策还处于制定过程中，她面临很多

压力，一方面来自北京、华盛顿以及岛内中间选民，另一方面深绿的势力依然不小，还出现了诸如太阳花运动等折射出的社会活跃力量等新因素。蔡英文的大陆政策将会对他们的投票产生影响。对华盛顿来说关键的问题是，她的大陆政策会对台海和平产生何种影响，特别是她是否接受“92 共识”和一个中国的表述。民进党显然不喜欢目前大陆对“92 共识”的表述。从岛内民情看，自 2012 年以来他们对台海关系的支持一直在下降。第四，香港问题。卜睿哲等美方学者声称，香港正在发生的事情与台湾有些类似，这里发生的麻烦也是内生的，而非外部原因造成的，是公民抗议，民众要求更多政治发言权。美国没有做任何事情，更没有挑唆，指责美国是不公平的。

第二，网络安全问题。中方学者提到中美两国都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在网络使用方面需要制定规则，但美国最近对中国五名解放军的制裁是一件十分恶劣的事件，对两国的网络安全合作造成不利影响。李成、李侃如等美方学者指出，中美之间的网络安全议题是个严肃问题，网络安全的影响也是实实在在的，重大的。美国希望尽快解决网络攻击问题，也希望中方尽早恢复中美网络对话。李侃如也承认，在斯诺登事件之后，美国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对华施压不再那么有效。

第三，海洋安全问题。吴心伯提出，希望美国能够减少对中国的海空抵近侦察。他指出，去年美国对中国航母演习舰队的介入式侦查，十分危险和莽撞。美国可以在公海监督中国的军事演习，但相遇时应该有规则，不能莽撞。吴心伯还指出，美国政治领导人应该具有战略视野，将这些侦察行动置于其领导之下，这些行动还应该反映中美军事交流的进步和中美总体关系的进展，而不能让军方自行其是，毕竟这将会影响到中美政治关系。在南海问题上，吴心伯、贾庆国等人担心，在菲律宾就南海争端诉诸国际仲裁法庭之后，美国国会火上浇油，鼓励越南效法，使南海争端更加复杂化。波拉克指出，在抵近侦察问题上，中美存在真正分歧。美国将会继续使用其手段来侦察中国的军事活动和情报，因为这涉及到中国是否愿意及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公开其军事信息。当然，如果真的发生海空事故，对两国军方关系来说将是极为不幸的，甚至会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灾难后果。李侃如指出，中美目前在海空相遇准则以及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是十分重要的成就，还可以进一步建立类似措施，防止发生军事意外。

第四，中日关系问题。杨毅、吴心伯、贾庆国、袁鹏等人指出，在中日关系中，历史问题依然在起作用，特别是今年是二战胜利 70 周年，日本安倍首相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可

能是中日关系的最大变数。此外，安倍在积极扩充军力，解禁集体自卫权和武器出口，迎合国内的右翼势力，这也增加了周边国家对日本走向的担心。对于日本军费问题，李侃如回应道，长期以来日本军费开支都在下降，只是近年来才缓慢上升，而中国的军费一直在快速上升，指责日本是不对的。

在两天的会议中，中美两国学者以务实、坦诚和建设性的态度回顾了两年来中美关系取得的积极进展，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两年如何进一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献智献策，会议达到了预期目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今后将继续合作，共同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

(韦宗友 撰稿 吴心伯 审核)